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小阿瑟·施莱辛格 史学思想研究

谈丽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The History of Western Ideas and Cultures

小阿瑟·施莱辛格 史学思想研究

谈 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谈丽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

(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9-11837-7

I. 小… II. 谈… III. 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 IV. K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8961 号

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

谈丽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875 字数 298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37-7/K · 549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美国的精英们，他们都是“新史学”的坚定支持者，是美国历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层面，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微观领域，探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决策过程以及个人品质。他们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传统的“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行动和选择共同塑造的。他们还主张历史研究要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和命运，揭示历史中的不平等和社会冲突。这些新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理论支撑。

知道施莱辛格这个名字，还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习美国史，曾读到一本由当时美国驻华机构印刷的中英文对照的介绍美国历史的小书，书名叫《源远流长》，虽是戋戋小册，但气势宏大，叙述精要流畅，文字十分优美，读后甚是喜欢，此书的作者是阿瑟·梅耶·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此君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是“新史学”的倡导者之一，他在社会史、城市史和妇女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后来又慢慢知道施莱辛格的儿子小阿瑟·梅耶·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更为了得，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史学成就远远超过了乃父，他的成名作《杰克逊年代》被视为是“进步主义史学”的标志性著作，由此关注起小施莱辛格其人其著。

从 20 世纪美国史学发展进程来看，小施莱辛格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学家，其出身于名门史家，从小就受到父亲治学的熏陶和影响，就读哈佛大学时，又得到名师派瑞·米勒和马西森的指点，1939 年 22 岁时，便已出版了根据他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一个朝圣者的成长》，此后几年又研究撰写了《杰克逊年代》一书，并于 1945 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不仅获得了普利

策奖,更是一举奠定了他在美国史学界的学术地位,其时他才刚刚 28 岁,可谓是少年成名,此后,他更是终身笔耕不辍,到 2007 年 90 高龄去世,由其儿子编辑的小施莱辛格的日记《历程:1952—2000 年》,于 2008 年出版。其超过 60 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留下了《罗斯福年代》《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和《美国历史的周期》等十数种史学专著和成百篇的论文与时评,一生中获得过 2 次普利策奖、2 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 1 次美国历史学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1998 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勋章。小施莱辛格视野开阔,知识渊博,著述宏富,研究主题紧紧贴近时代,他崇尚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最有代表性的两部巨著《杰克逊年代》和《罗斯福年代》,采用文献档案和口述史并重的史学方法,把思想史与政治史研究结合起来,分别从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杰克逊当政时期美国如何由精英民主政治向大众民主政治转型,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罗斯福当政时期,美国如何通过实施“新政”改革来摆脱经济大萧条困境,从而推进社会改良与社会进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叙述与分析了美国历史上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杰克逊年代》一书打破了“边疆学派”对杰克逊民主是中西部蛮荒边疆产物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杰克逊民主同样有重要的东部起源,并强调阶级冲突是发生社会变革的动力的观点,被学界认为是“具有成熟的眼光和分析性的思考”(著名史家霍夫斯塔特语)。《罗斯福年代》一书则着重关注“新政”的哲学基础和观念、人性的角力,强调个人及其思想乃至民众心态在促成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他不再过分强调阶级冲突的唯一性,而是过渡到了论证“美国的政治传统主要是基于一种自由主义的和谐一致”的观点。三卷本的《罗斯福年代》被称为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传统的三部曲”。他的著述被奉为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要研究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与小施莱辛格上述两部著作对话和作出回应。

不仅在思想上如此,在行动上亦然。小施莱辛格在教书治学的同时,也十分热衷于政治,他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对于承担学者—公民的双重责任毫不懈怠。和父亲一样,他也是民主党的忠实拥趸,他赞赏民主党从杰克逊—威尔逊—罗斯福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从 20 世纪 50 年

代进入民主党领导层小圈子以后,曾积极参与肯尼迪、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的竞选班子的助选,还与著名经济学家 W·W·罗斯托一起,成为白宫的重要幕僚和智囊。小施莱辛格以学者从政,虽未达到像共和党中基辛格那样“出将入相”的高度,但也算得上如戴维·哈泼斯坦所称的是“出类拔萃之辈”,美国评论界称他“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核心圈”,他的史著《一千天》和《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正是反映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政治权力运作和政治事件变幻的独特观察、记录和思考。他为自由主义张本,不遗余力地为自由主义摇旗呐喊,被认为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史学家。

由于小施莱辛格经历复杂,又常常介入到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种种论争之中,其对美国多元文化社会、冷战与美外交、美国总统制度及美国历史周期等问题均有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曾被贴上“进步主义史家”“‘美国一致论’的代表人物”和肯尼迪王朝“宫廷史家”等标签,是20世纪美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多重面相、褒贬不一、颇具争议的人物。在中国,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除了《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和由其主编的《美国政党史》有中译本之外,他的重要著作《杰克逊年代》《罗斯福年代》《美国的历史周期》《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帝王般的总统》以及《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等,目前都无中译本。而事实上,对小施莱辛格的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剖析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20世纪美国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理解。

谈丽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确定了以研究小施莱辛格的史学与史学思想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面对如此一位“大象”级的研究对象,难度无疑是巨大的,她为此颇费心力,在国内外收集了小施莱辛格几乎所有已公开发表与出版的论著,包括他的自传和日记。通过潜心研读文献资料,爬梳考辨史实,缜密分析思考,用了整整4年时间写作完成了她的学位论文,在通过答辩时就得到了以王斯德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本书就是谈丽博士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用了5年多的时间作了大量的补充和修订,几易其稿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谈丽研究的对象是人物,但传主不同于那些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或长袖善舞的工商家等以实践行动得以鲜明呈现的人物,而是一个主要靠著书立说来奉献思想智慧的历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要写作的是一部小施莱辛格的思想传记。为此,她把小施莱辛格的史学和史学思想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动态语境中加以考察,深刻地透视与发掘蕴含在史学著述和史学论战背后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意义。在本书的十一个章节中,除了出身与教育背景一章之外,谈丽通过六个章节来剖析小施莱辛格最重要的六部著作,三个章节呈现小施莱辛格参与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论战以及史学争鸣,一个章节讨论了美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问题,不仅为我们描绘出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一幅清晰的思想肖像,同时也勾勒出20世纪美国史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轨迹,在许多方面反映出她的深邃思考和独特见解。就此而言,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史学史和思想史著作。

西方史学史研究历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优势学科之一,在老一辈历史学家耿淡如教授、张广智教授的倡导和培育下,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子,特别是近20年来,在西方史学史的诸多领域均贡献出很好的学术研究成果及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仅就20世纪美国史学史领域,就有对《美国历史评论》与美国史学发展、鲁滨逊和“新史学”派等研究专论,也有对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丹尼尔·布尔斯廷及威廉·麦克尼尔等人物的专题研究,谈丽博士所奉献的《小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无疑也是这一领域中的重要硕果之一。

顾云深

2015年8月

前·言

职业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影评人、总统顾问、《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对象……这些职业与身份之间似乎很少出现交集，尤其是当这个交集的产生需要满足上述所有选项的条件下。然而它确实存在，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是 20 世纪美国的一位职业生涯颇为特殊且极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他就是小阿瑟·迈耶·施莱辛格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

小施莱辛格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出身于史学世家，学术功底深厚，涉猎广泛。他的代表性著作或颠覆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或是一个领域的开拓之作，均在学术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并成为经典作品。由于他的许多论著主题贴近时代，视野广阔，观点鲜明，叙事生动流畅，文笔优美贴切，极具可读性，因而在学术界之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小施莱辛格的著作曾多次荣获各类重要学术奖项，他所主编的大量关于历史和政治的学术著作及通俗读物在美国社会也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小施莱辛格还是一位从政经历十分丰富的学者，他是“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为从杜鲁门到肯尼迪兄弟等多位著名民主党政治家服务，尤其是在阿德莱·斯蒂文森和约翰·F·肯尼迪的总统竞选班子中担当过重要的角色，并曾应邀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特别

助理,1965年曾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封面人物。^[1]

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学研究涉及许多在美国有重大争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从学界到政界,又从政界隐退回到学术界的经历在独具特色的美国知识分子议政、谋政、参政现象中也极具代表性。了解这样一位史学家的学术研究、思想路径和治学、从政的经历,有助于从多角度观察和理解美国史学史、政治思想史及当代社会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对理解美国知识界和政界的密切关系的根源、历史和现状,了解美国学者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也不无裨益。更何况,如果说他的职业肖像虽然色调极其丰富却依然清晰可辨,那么他的思想肖像却有着多重面相,它们不太容易区分,而且常常模糊不清,有时还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扭曲,使人难以分辨,同时又引人深思。

作为史学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进步主义学派的一员,有人却把他归入“和谐派”;有人说他是“宫廷史学家”,制造了“肯尼迪神话”,“他撰写的所有历史都服务于论战的目标”;也有人赞美他不仅是“卡米洛的史学家”,“他的作品符合最高的学术标准,同时又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2]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他被认为始终是一名坚定的自

[1] 小阿瑟·施莱辛格本人的论著参见后附参考文献,其中《杰克逊年代》(*The Age of Jackson*, 1945)于1946年获普利策历史著作奖;《旧秩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 1957)于1957年获弗朗西斯·帕克曼奖,1958年获班克罗夫特奖;《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1965)于1966年获普利策传记奖、国家图书奖;《罗伯特·肯尼迪及其时代》(*Robert Kennedy and His Times*, 1978)于1979年获国家图书奖;1967年小施莱辛格被授予美国文学艺术协会历史学金奖。小施莱辛格主编的主要著作参见后附参考文献。“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简称“ADA”,是美国的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政治组织,成立于1947年,创始人包括埃莉诺·罗斯福、休伯特·汉弗莱、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等。

[2] Arthur Mann, “The Progressive Tradition,” in John Higham 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2, pp. 157-179; John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16-217; Lily Geismer, “Kennedy and the Liberal Consensus,” in Marc J. Selverstone, ed., *A Companion to John F. Kennedy*, Wiley Blackwell, 2014, pp. 499-518; William E. Leuchtenburg, “John F. Kennedy, Twenty Years Later,” *American Heritage*, Vol. 35 (Dec., 1983), pp. 51-60; William Voegeli, “Crisis of the Old Liberal Order,”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Summer 2007, pp. 20-23; David Greenberg, “Not Just Camelot’s Historian: The Vibrant Scholarship of Arthur Schlesinger Jr.” (转下页)

由主义者,为铸造战后“自由主义共识”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由主义面对重重困境已经江河日下,成为不切实际、危险和幼稚的同义词,而使许多人已经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他却仍然睥睨一切地站在公众视野中,成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却开始把他归入保守主义者的行列。^[1]而他对美国国际、国内左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则更令人难以捉摸,他被认为是纽约知识分子的“表亲”,又是“冷战知识分子”的当然成员,同时又有人谴责他同情共产党员。^[2]这些不同的说法,是本质的反映?是后人无心贴上的标签?还是激烈论战中意图明显的修辞?

不难看出,上述许多评价都牵涉到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关系。或许在20世纪的美国,确实没有谁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历程、兴衰史和思想地位的联系比小施莱辛格更为紧密了:他撰写的《核心》(*The Vital Center*, 1949)一书创造了自由主义的关键词,他的《杰克逊年代》(*The Age of Jackson*, 1945)和《罗斯福年代》(*The Age of Roosevelt*, 1957-1960)发掘了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历史传统;他的《美国历史的周期》(*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1986)一书被认为勾画了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轮廓,进一步阐释了“自由主义万岁”这一历史主题并且向世人宣告,自由主义并没有死亡,只是处于历史周期的低谷;而他本人为肯尼迪政府的服务和为肯尼迪兄弟撰写的传记则定义了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对于他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这种密切联系与对其作出的重大贡献,赞扬者

(接上页)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obit/2007/03/not_just_camelots_historian.single.html?wpisrc=burger_bar) ; Daniel Feller, “Arthur Schlesinger, Jr.”, in Robert Allen Rutland, ed., *Clio's Favorites: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200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p. 156-169.

[1] “Arthur Schlesinger,” *Economist*, Mar 8th 2007 (<http://www.economist.com/node/8810722>) ; James Nuechterlein, “The Last Liberal,” *First Things*, August, 2001, pp. 33-42; 张兹暑:“美国新保守主义史学”,《高校社科信息》2004年第4期;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的话”。

[2]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chael Wreszin, “Arthur Schlesinger, Jr., Scholar-Activist in Cold War America: 1946-1956,” *Salmagundi*, No. 63/64 (Spring-Summer 1984), pp. 255-285.

有之，贬斥者亦有之，但都没有人否定。^[1] 然而作为一位学术视野开阔、在史学领域耕耘多年且获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史学思想亦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创新独到之处，已经影响了两代人对美国历史的讨论。虽然由于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领域大多与美国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加上他本人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活跃的政治实践，从而令读者极易将其学术研究同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过于强调其中的政治因素而忽视了他在历史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虽然小施莱辛格的从政经历和他的政治思想对他的学术生涯影响极大，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认可，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活动与其作为公民的活动是可以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应当分离的，这是两种不同的责任，或许会有交集，但大多数情况下应当严格地加以区分；如果我们承认，虽然一个人的政治观念嵌入在其主体意识结构中因而无法回避，但其本人对这一点有无自觉的意识，会极大地影响其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那么一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与史学思想本身显然应该成为对其进行较全面研究中的主体部分和前提条件。小施莱辛格在对美国学者迄今唯一一部研究他本人的专著的书评中遗憾地表示，作者不太关心小施莱辛格的历史作品本身，这造成了对其描述的扭曲，“因为，虽然小施莱辛格为传统自由主义辩护的愿望可能只有次要的效果，但对努力重建过去的与生俱来的迷恋却极有可能是他的主要动机”^[2] 这只是他面对指责为自己做的又一次辩护？还是他有意识地明辨两者关系并努力在其间保持平衡的真实表述？

小施莱辛格思想肖像的多重面相还来源于其矛盾的学派归属，这在

[1] Alonso L. Hamby, "The Vital Center, the Fair Deal, 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3 (Jun., 1972), pp. 653-678; Alexander Bloom, *Prodigal Sons: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Benjamin R. Barber, "America as a Monumental Gambl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 16, 1986; Kevin Mattson, *When American Was Great: The Fighting Faith of Postwar Liberalism*, Routledge, 2004; Lily Geismer, "Kennedy and the Liberal Consensus".

[2]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eview o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69, No. 4 (Dec., 1996), pp. 660-662.

很大程度上与史学史研究的路径有关。撰写史学史的一种常见且重要的方式是定义各种“学派”和“运动”，并把史学家分门别类地归入其中。这种方法有利有弊，优势在于简洁明了，有助于了解与各种主题相关的解释的变化及史学发展的长期趋势；缺点则在于各种学派与运动的定义往往是一种研究者事后发明出来并强加于那些在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具有此种身份认同的人物身上，“一旦被创造出来，类型就呈现出一种专制的特征，或者也可能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几乎失去了意义”。^[1]这种做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往往会忽视史学家的个人特征，史学家主要是作为个人进行思考和写作的，而且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往往改变观点，这种转变有时如此之大以至于会令旁人感到其中明显的自相矛盾。我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对美国历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人物、学派和思潮已有一定共识，并开始超越对学派更替和研究范式变化关注较多、对宏观发展过程关注较多而对史学家的个案研究关注较少的阶段，但具体的实证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尚不丰富。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史学家的情况在现实中是十分复杂的，许多人很难被归入任何一个学派，小施莱辛格即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人物：他的史学思想受到“新史学”的巨大影响，但其历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却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新史学”看似背道而驰；他的历史观当中有“冲突论”的影响，但不完全是“冲突论”，与“和谐论”有相通的地方，但又不同于和谐论。这种现象在社会动荡、文化转型和多重思潮交汇碰撞的时期尤为明显。

小施莱辛格的思想肖像之所以如此模糊，与学术界迄今对他还没有比较全面的研究自然也有相当的关系。美国学术界对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及从政经历的介绍和评论颇多。其中大量的是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对小施莱辛格主要学术论著的书评，短小精悍，观点鲜明。许多学者在对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领域的历史著述进行研究和评论时会涉及小施莱辛格的相关著述和研究方法，并对其地位与影响进行评价，小施莱辛格的所有代表性论著以及他标志性的“历史周期”理论都历经诸多学者的品评。这些作者常常会在对其史学著述进行分析时论及小施莱

[1]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p. vii.

辛格的从政经历,一些学者在讨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更经常以小施莱辛格作为反面例证。^[1]以小施莱辛格其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专著目前还不多。其中一部分学者在论述中大多均会涉及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学研究,但往往更关注他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他们大多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研究带有较强的为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辩护的色彩。詹姆斯·纽希特雷恩在《小施莱辛格及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异议》中把小施莱辛格作为理解“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的切入口。他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历史写作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其历史和政治分析的核心是阶级冲突理论,不过小施莱辛格所指的实际上是美国社会中的不同群体,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阶级”;他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保守主义的洞察力”与“自由主义的本能”之间的固有冲突。^[2]迈克尔·瑞辛的《小施莱辛格,冷战美国的学者—积极分子:1946—1956》把小施莱辛格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来考察“一群冷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于当时的党派偏见,在何种程度上接受了其政治对手的一些最坏的手段,助长了使麦卡锡和麦卡锡

[1] Arthur Mann, "The Progressive Tradition"; Charles Grier Sellers, Jr., "Andrew Jackson versus the Historians,"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 44, No. 4 (Mar., 1958), pp. 615-634; James West Davidson and Mark Hamilton Lytle, "Jackson's Frontier — and Turner's," in *After the Fact: The Art of Historian Detec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2, pp. 83-112; Donald B. Cole, "The Age of Jackson: After Forty Year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4, No. 1 (Mar., 1986), pp. 149-159; Thomas B. Silver, "Coolidge and the Historians," *American Scholar*, 50 (1981), pp. 501-517; Elliot A. Rosen, "Roosevelt and the Brains Trust: An Historiographical Overvie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7, No. 4 (Dec., 1972), pp. 531-557; Otis L. Graham, Jr., "Historians and the New Deal, 1944-1960," *Social Studies*, 54 (1963), pp. 133-139; Morton Keller, "The New Deal: A New Look," *Polity*, Vol. 31, No. 4 (Summer, 1999), pp. 657-663; Terrence J. McDonald, "History Under the Sign of Assimilation,"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2, No. 2 (Jun., 1994), pp. 358-364; Lawrence W. Levine, "Multiculturalism: Historians, Universities, and the Emerging Nation," in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anons, Culture and History*, Beacon Press, 1996, pp. 158-169; Frank L. Klingberg, "The Historical Alteration of Mood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4, No. 2 (Jan., 1952), pp. 239-273; Samuel P. Huntington, "Paradigms of American Politics: Beyond the One, the Two, and the Ma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9, No. 1 (Mar., 1974), pp. 1-26.

[2] James A. Nuechterle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the Discontents of Postwar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9, No. 1 (Jan., 1977), pp. 3-40.

主义繁荣的氛围”。正如作者所言，“这是对一位作为‘严阵以待的’党人和高超辩论家的重要美国史学家的研究，聚焦于其政治撰稿人和战略家而不是学者的角色，虽然这些职业常常是重合的”^[1] 斯蒂芬·德普的《小阿瑟·M·施莱辛格和美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史》是迄今美国学者的唯一一本研究小施莱辛格的专著。作者将小施莱辛格作为历史学家的话语定义为面对读者所进行的论证，从修辞的视角来研究周期概念在其中的起源、基础和不断变化的意义。他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历史研究深受其本人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影响，“美国历史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周期性支配为特征”的观点既是小施莱辛格历史学研究的中心，也是他的政治观点和政论文章的中心；小施莱辛格在其职业生涯中一直尝试用该观点为自由主义政府和领导人的杰出成就与合法性进行辩护。^[2]

相比较而言，一些史学家更倾向于以作为历史学家的小施莱辛格为研究对象，他们显然更关注其学术生涯、史学著述与史学思想。有两部人物编排格式的重要史学史著作均把小施莱辛格收入其中。英国史学家马库斯·坎利夫和美国史学家罗宾·温克斯合作编撰的《大师：美国史学家掠影》收录了包括小施莱辛格在内的13位以美国史为研究领域的美国史学家。编者们选择的标准是学术影响和代表性。这些学者必须已经拥有卓著的学术声誉，“《大师》所品评的史学家无论作为教师、研究的启迪者还是通过他们的历史解释，或是二者兼备，对美国史学研究的现状都有显而易见的重要影响。有影响的学者的一个标志是，他的研究者发现自己在多年以后仍然在谈论这个人和他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喜爱或赞同，却无不感到一种微妙的联系。他们或许尊敬他，或者嘲笑他，却不可能把他排除出自己的思想”^[3] 他们还必须代表着史学发展

[1] Michael Wreszin, “Arthur Schlesinger, Jr., Scholar-Activist in Cold War America: 1946-1956,” *Salmagundi*, No. 63/64 (Spring-Summer 1984), pp. 256-257.

[2] Stephen p. Depo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4; 对小施莱辛格的评价还可参见 Patrick Diggins ed., *The Liberal Persuasion: Arthur Schlesinger, Jr.,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P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xi.

中不同的重要方向，“他的印迹在其中不可磨灭，又或许这个领域就是他的创造”。^[1]因此在当代美国史学家，派瑞·米勒代表了思想史和清教史研究的发展，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代表了把观念史和心理学、社会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趋势，弗拉格·比米斯代表了美国内外史研究；戴维·波特同时代表了内战史和国民性格研究的发展，C·范恩·伍德沃德则是南方史领域的杰出阐释者；奥斯卡·汉德林是社会史和移民史的代言人，丹尼尔·布尔斯廷对“美国人”感性层面的探求具有持久的意义，并且两人都致力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化；小施莱辛格的学术生涯则让人们聚焦于每一个不想沉溺于好古癖的历史研究者都备感困惑的问题：“史学家对其时代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他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此时此地的政治斗争？这样的人会威胁到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吗？或者正相反，他有可能通过对权力核心的直接认识而学会理解吗？”^[2]坎利夫本人撰写了关于小施莱辛格的一章，介绍、评价了小施莱辛格从早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论著，对其史学贡献，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认可。他认为一些学者所谓的政治立场导致学术研究的“偏见”与史学界的“客观性”观念确实一度影响到小施莱辛格的职业地位，但显然不应当狭隘地去理解，“所有史学家都是有偏见的，除非他们研究的时代过于久远，不会影响到任何人”。^[3]在他看来，小施莱辛格虽然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却一直对美国保守主义思想表现出“同情的理解”，而小施莱辛格对“中立”和“客观性”这两种立场的区分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理解。

罗伯特·艾伦·拉特兰编撰的《克丽奥的宠儿：美国杰出史学家，1945—2000》则收录了12位以美国史为研究领域的美国史学家。编者发现《大师》中的4位史学家“仍然值得尊敬”^[4]，他们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戴维·波特、小阿瑟·施莱辛格和C·范恩·伍德沃德；他选择的另外8位是伯纳德·贝林、默尔·柯蒂、戴维·赫伯特·唐纳德、约

[1] Marcus Cunliffe and Robin W. Winks, eds., *Pastmasters*, p. xii.

[2] Ibid., p. xiii.

[3] Marcus Cunliffe, “Arthur Schlesinger, Jr.,” p. 356.

[4] Robert Allen Rutland, ed., *Clio's Favorites: Leading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2000*,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 1.

翰·霍普·富兰克林、霍华德·罗伯茨·拉马尔(Howard Roberts Lamar)、阿瑟·林克、格尔德·勒纳(Gerda Lerner)和埃德蒙·S·摩根。选择的标准是史学家研究成果的质量、他们在本研究领域的影响、他们的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小施莱辛格一章的作者是美国史学家丹尼尔·费勒。他认为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小施莱辛格在美国史学家中一直拥有一种独特的地位,这种地位既来自小施莱辛格在多个领域的奠基性著作和他无人能及的叙史能力,也来自伴随他终生的争议。费勒同样赞赏小施莱辛格杰出的史学成就,但显然认为参与政治从而成为“历史中的行为者”给史学家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而非报偿。他认为小施莱辛格以一种“工具主义的方法”对待历史,“他的著作更像辩解而不是分析,他的历史不过是他政治磨坊中待碾的谷物”^[1],并且小施莱辛格本人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实干的政治自由主义者。费勒虽然并非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所说的那种与传主“势不两立的对手”,但他没有能够更全面深入地解读小施莱辛格的史学论著,尤其是那些虽然为数不多却完整阐释了其史学观的论文,也并不熟知小施莱辛格政治经历就得出此结论,有失严谨。

在美国当代史学家中,知名的政治史家肖恩·威伦茨尤其关注小施莱辛格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或许由于其研究领域及学术取向,威伦茨深受小施莱辛格的影响,小施莱辛格及其《杰克逊年代》是启发他写出《民主的呼声》和《美国民主的兴起》这两部重要著作的关键史家和史著。他在回顾自己学术历程的时候表示,小施莱辛格的这部经典之作“自上而下,同时也自下而上地撰写历史”,让他开始认识到,过去的政治并非一些史学家所谓的“精英遮蔽了普通人的声音或者与之妥协的地带,而是相互竞争的政治力量必须直面各种异议的领域”^[2],而小施莱辛格对并非知名人物的激进派思想家在构建杰克逊民主中作用的揭示,与汤普森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工人和中产阶级改革者知识分子的思想维度的意义是一样的;这本书不仅影响了他对美国民主兴起的研究,也是

[1] Daniel Feller,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p. 157.
[2]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xiv-xv.

现代学者研究美国民主的最重要作品。^[1]

威伦茨在长期的治学生涯中逐渐发现，在研究美国史及其殖民地时期历史的美国史学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均出生于1900—1920年间，各自的专业领域并不相同，观点也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都创造性地对待之前所谓的进步主义史学家的遗产”，“这开启了新的研究和重新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家及其读者思考美国往昔的方式”。^[2]这一群体中的知名史学家有戴维·赫伯特·唐纳德、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约翰·海厄姆、埃德蒙·S·摩根、戴维·波特和肯尼斯·斯坦普等，小施莱辛格、C·范恩·伍德沃德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则是这一代美国杰出史学家影响最大、也最知名的3位。这个群体在美国史学史上拥有与进步主义史学家同等重要的地位，他们都反对进步派简单化地理解美国历史中的冲突，威伦茨却认为不应当将其简单地归入“和谐派”，而把他们称为“自由主义史学家”。这一代史学家没有抛弃“有用的过去”的进步主义观念，但为美国历史带来了“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不同的意见”。他们想要更具包容性，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过去的史学家所轻视的方方面面如种族、族裔和非理性象征的力量；他们想要更具批判性地重新解释主导了美国历史的自由主义传统，摆脱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虚伪的平民主义，也摆脱许多自由主义史学传统的羁绊。^[3]

2000年以来，威伦茨陆续在一些长篇书评和导论性文章中介绍了这三位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及生平，其中小施莱辛格是他着墨最多的一位。他认为小施莱辛格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完全契合新史学的研究方向，他关注历史中的“局外人”，无论是奥雷斯蒂斯·A·布朗森（Orestes A. Brownson, 1803-1876）、穷人还是劳工阶层，他笔下的美国政治领袖，从杰克逊、小罗斯福到罗伯特·肯尼迪，无一例外都是这些历史

[1]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p. xix-xx.

[2] Sean Wilentz, “Historians Making History, Schlesinger, Woodward, and the Liberal Era i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The New Republic*, Sep. 15, 2014, p. 31.

[3] Sean Wilentz, “What Was Liberal History?” *The New Republic*, July 10 & 17, 2006, p. 22.